

哲学的教育与“不可教”的哲学

陈亚军

内容提要 哲学作为一门爱智之学,并不重视结论,而更看重理性的批判和质疑。它是对确定信念的反思,是对既定知识的审问。它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。这种爱智之学是不能简单用讲授知识的方式教给学生的。而今日的哲学教育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,将不可教的智慧拼命地用教授知识的方式教给学生,而把哲学的可教部分即它的理性思维、问题意识的训练放在一个极为次要的位置上,极大地忽视。这是当今哲学教育的致命弊端。

关键词 智慧 教育 问题意识 逻辑

陈亚军,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210093

希腊人说的 *philosophos* (英语 *philosophy*) ,国人今译“哲学”(据说由日本人转译而来),其本义是“爱智慧”。智慧和人的慧根、阅历、境界有关,断不是课堂上教得出来的。课堂上教的是知识,是“水是 H_2O ”;“不说谎是好孩子”等等,哲学却要告诉人:“水未必是 H_2O ”;“不说谎未必是好孩子”。

“水未必是 H_2O ”不就是“水是 H_2O ”的反命题,这么说还不就是在教授一种观点?先不要着急,让我们停下来细细琢磨一下。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但却却是根本的差异:“水是 H_2O ”是一个化学结论,它表示人类探究的告一段落,对于个体来说,它意味着一种先定的真理,固定了我们看世界的眼光;我们拥有这样的知识越多,便越是博学,越能解答人们的疑惑,给人以确定的关于世界的信念。而“水未必是 H_2O ”却不是一个

结论,它并不明确地告诉你水是什么,真理是什么,而只是不断地对你所奉为圭臬的东西置疑、诘难。它不像前者那样,为你的心灵之镜增加内容,而只是要将这面镜子擦亮,至于用这面镜子去照什么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情。

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,哲学是治疗性的。这意味着说,哲学这门学问的性质有点像精神疗法。对于一个精神病人,要治疗他的疾病,光用提供信息的办法是行不通的,必须对信息加以重组。病人有他自己的世界,只要他坚持自己病态的世界观,不论你怎样用“我是你的朋友,你看,我手里没有武器,不会伤害你的……”,都不会让他确信你不是他的敌人。要改变这种状况,只能在催眠状态下转换他理解世界的整体框架,在新的理解框架中,一切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。哲学的工作性质与此近似,它是一门思考的学问。学富五车者肯定是学问家,但未必是哲学家。知识的积累对于哲学思考

固然是必要的,但肯定不是充要的。哲学和其他学科的不同点在于,它往往不是为我们提供新知识,而是对已有知识的一种格式塔式的再诠释,是一种全角度的转换,通过这种转换,我们对已有的事物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。于是,哲学就不能只满足于形而下的知识的积累,而应该(也必须)上升到形而上的自由领域,作无拘束的思索;不羸缚于“已然的世界”而上升到对于“可能世界”的关注。这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必要条件,也是哲学这门学科的价值所在。因此,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来说,既要有丰富的学养,同时更要保持精神的空灵状态,对已有的所谓“定论”做无定的反思。哲学是“爱智慧”。什么叫“智慧”?智慧无非是就同一个对象,同一件事情,看到了别人所没有看到的方面,想到了别人所没有想到的东西。古训“读万卷书,走万里路”,目的无非是教人长点哲学头脑。

知识是可教的,智慧、思想怎么教?牟宗三先生有言:四十岁之前不可能懂得哲学为何物。其意思是,智慧是见微知著、举一反三的敏锐,是高屋建瓴、审时度势的能力,是侧着脑袋追问为什么的执着,是不被风俗、常识、权威、传统所屈服的性格。它不是啃几本书,背几段定理、名言所能达到的;它凝聚着丰富的学养、厚重的人生再加艰苦的探究,没有几十年的磨练,难以体味它的奥妙。就此而言,牟先生断言成立,但对此不能作极端的理解,否则他就不该在大学里混饭吃了。

依我的看法,哲学一方面确实是不可教的,如果“教”指的就是传授知识的话;但另一方面,如果“教”还能作另一种理解,还能有训练思维、学会置疑的涵义的话,那么哲学又是可教的,否则何以有“柏拉图学院”的存在?哲学的“教”不是教人学会知识,而是教人学会无知。苏格拉底曾经说过,他和别人的不同在于,他知道自己的无知。一部《理想国》,实际记载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诲,从中可以看到,苏格拉底的“教”大都以问号结束,句号不多更不用说惊叹号了。

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化身,他的死最能反映出哲学的精神。当雅典被它的一整套伦理规范所束缚,同时也由此获得一种稳定时,苏格拉底开始诘难了。他向既定的信念挑战,凭借理性而蔑视众人的围攻。他动摇了在许多雅典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信条,让人们看到了“有识者的无知”。哲学和知识似乎构成一种“对立的统一”。前者强调批判、怀疑、开放,后者追求确定、信念、封闭。没有前者,后者会停滞、僵化乃至死亡,没有后者,前者

只会留下一片燃烧后的灰迹。生活当然不能没有信念,但生活的信念需要哲学来润滑。苏格拉底的无知,使有知者看清了自己的有限。天经地义的大厦出现了裂缝,阳光开始渗入。苏格拉底的死以尖锐的方式将哲学与常识、信念的冲突摆在人们面前。他的死富有象征意味:知识杀死了哲学,哲学成全了知识。苏格拉底的死既使人们看到了常识的力量,也使人们看到了哲学的可敬,挑战固有的信念、习俗、教条,面对千夫所指,虽百死而不悔!对此,英国才子阿兰·德波顿说得好:“那一夜,在冰封大地的上空,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。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,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。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,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。”^[1]

需要指出的是,哲学的怀疑是一种理性的怀疑,不是矫揉造作式的故作惊人之语。对于流行信念的盲目崇拜是哲学的敌人,而对于它们的盲目否定并不因此就是哲学的朋友。后者无非是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一种肯定的结论,骨子里仍缺少理性的怀疑精神。永远听从常识和永远不听从常识,都不是哲学的选择。哲学反对对于常识的无条件的听从,但若是无条件的反对却并不等于哲学。哲学只是一种智慧,不是结论。这种忽视结论的智慧怎么能像知识一样地教给学生呢?

二

进一步地,我想到了眼下的哲学教育。

只要瞥一眼贴在墙上的课程表,再翻一下哲学教科书,我就自己直感到太实了,太实了。眼下有种形象的说法,叫“填鸭式的教育方式”,这种方式用在其他学科已经是弊端无穷,用在哲学上更是大错特错。密集的课程在时间上剥夺了思考的可能,而重视结论轻视推论的教科书又彻底挤占了心灵的内在空间。哲学成了一堆颠簸不破的真理,教授哲学就是将这一堆真理作为结论塞给学生,真理之由来的过程消失了,思考的智慧不见了,哲学的魅力荡然无存。长此以往,哲学课堂中走出来的只能是一些会背几句教条的书呆子。这难道是哲学教育的初衷?这样的哲学教育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?它把哲学变成了哲学的敌人。

显然,这种哲学教育与哲学性质相违背的状况必须改变。如何改变?我以为,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,是要让学生知道,哲学是一门自由之学。哲学的思考必须是完全自由的,不能有任何先在的前提;不光不能有来自官场的、商场的乃至坊间时尚的前提,甚至也不能有来自所谓物理事实

的前提。没有这一精神,就不会诞生哥白尼,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的问世。一个人,除非能努力培养自己进入形而上的境界,否则是与哲学无缘的。钱理群先生的一段话以诗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点:“我们的精神世界、我们的思维空间在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的挤压下,已经越来越狭窄,我们的翅膀飞不动了,我们的创造力削弱了,我们甚至失去了想象未来的能力,失去了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,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死亡啊。”^[2]在一个死寂的精神世界中,哲学的火焰是无法燃烧的,而没有哲学思考的火焰照亮,精神世界又只能注定是要死亡的。哲学是一门否定之学、超越之学,正是这种不倦的、无牵挂的向上腾飞,将人的精神激活,面前的世界才有了各种不同的意义。

古往今来,哲学大师们的孜孜所求,展示给后人的是他们那色彩斑斓的精神旅程。过去的话题仿佛一再重复,但每一次的重提都有着别样的韵味。这需要我们循着他们的心路,慢慢地品味。在他们的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作中,一次又一次的格式塔式的转换得以完成,重要的不是结论,而是这些结论背后思想所留下的脚印。哲学家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,不研读他的整个身世,就无法窥见他嘴里那句小孩都能脱口而出的格言的精蕴。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,你要知道什么是“绝对精神”吗?请研读《逻辑学》吧;当你从首页读到末页,你自然就明白了“绝对精神”的内涵。哲学大师们的身世就是他们的著作,他们的思想。哲学的教学应该带领学生进入哲学大师们的心灵深处,精读他们的著述,熟悉他们的思考。

精读原著,这一点我们一直都挂在嘴边,但很少真正落在实处。这里所说的“精读”是逐句逐段的精读,是精益求精的细活。读者一开始对此或许会感不适,觉得单调枯燥,但一段时间之后,其益处、妙处便会愈益显明。它不仅使学生对于所读的原著富有自信,对于自己把握的部分确信明白,从而为下一次的再读奠定一个确定坚实的基础,而且也使学生熟悉了哲学家本人的论证风格和技巧。经过长期的熏染陶冶,自己的哲学思维能力和论证能力就会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。同时,通过精读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的原著,还会使人意识到,他们眼下所信奉的学说原来是有其语境、时空条件的,是出自某种视点的,因而是偶然的,必会改变的。

一切先前的结论都是可以追问的,这种追问正是推进哲学思考的动因。理想的哲学教师不是知识的权威,而是“精神接生婆”,让学生学会怀

疑,学会“虚心”,自己提出问题并予以解答。不能只是在大师们的思想树荫下纳凉,在前辈的思想沙龙内跳舞,过去的著作只是攀崖的云梯,最终还要丢弃,迷信、盲从是哲学最大的敌人。

当下的哲学教学中,很大的一个弊端是没有鼓励学生的思考、质疑精神。诚然,改变这一状况非朝夕可以奏效,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借口。要做的工作或许很多,但有一种现在西方大学中流行而在我国却还鲜见的教学形式,这就是“研究讨论会”(seminar)。它一般由一位导师主持,其职责是提出问题,理清线索,并就学生的发言讨论作出点评,加以归纳。参与讨论的学生们须就某一话题独立地澄清自己的见解并予以论证。师生之间可随意辩难,讨论切磋。重要的不在于达成共识,而在于互激互励。这种形式的好处非常明显:它可以激发学生自己思考问题的兴趣,培养他们论证自己观点的能力,同时相互间的讨论还能够开阔视野,取长补短,并养成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辩论的雅量。对话是没有前提的,一切取决于是否合理。这种研讨会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。

“哲学是象牙塔中的学问”,这话常用来责备哲学的不走向社会。然而在我看来,哲学的价值和尊严往往就在象牙塔中,这里的意思有两点:第一,和其他严肃的学科一样,哲学是一种高强度的智力活动。它要求思考者专心致志,不受外界的纷扰。一种思考只有当它进入极致,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。而进入极致的思考一定要求一种非功利的精神状态,一种“忘却”——甚至忘却实然的自身。维特根斯坦是这种“忘却”的楷模。他不但生活在象牙塔中,最后甚至连象牙塔都不能忍受,而选择了更彻底的逃离。第二,和其他学科不同,哲学尤其要警惕来自社会的诱惑和结论。哲学当然应关心社会,但和社会保持距离,对社会习常思维持批判的态度,是哲学的使命所在。在今天,在倡导“哲学要为社会服务”的口号声中,我们尤其要强调,哲学乃是一种思考。思考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事物,思考的结论也不是由某种意志可以预先束缚的。从长远的眼光看,这才是哲学对社会的最大贡献。

三

最后,我想专门谈一谈哲学教育中的逻辑训练问题。这本是哲学教学中最“可教”的部分,然而却被我们的哲学教育极大地忽视了。本世纪上半叶流行于西方的逻辑经验主义曾经把哲学归结为逻辑,认为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对语言命题的逻辑分析。这种把哲学等同于逻辑的做法无疑是过于

狭隘了,但逻辑是哲学教学的重要一部分,应该是没有疑问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理由有两个。

第一,哲学是一门思考的学问,讲道理的学问。它既不能指望经验、常识,也不能求助于魅力、权威,它的力量来自于论证。在形而上的领域,没有经验的扶手可以凭借,在理性的王国,没有宗教的神秘可以祈求,逻辑成了最为有力的工具。在柏拉图学院的门前有“不懂几何学禁止入内”的告示。没有理性,没有逻辑,就没有哲学。历史上的确有过许多非理性主义、唯意志主义等等哲学流派,但其哲学家们,在宣扬自己的非理性主义主张时,仍然要用理性、逻辑来说服人。“废话!哪门学科不讲逻辑!连文学创作也不能不讲逻辑呀。”确实,只要是一门学问,就不能不要逻辑,但需强调,其他学科还有事实、情感、形象、隐喻等可以借助,而哲学则更重逻辑。哲学上的最大前提也许不能从逻辑中推出,但哲学的说服人是很难用逻辑之外的东西来帮忙的。

第二,强调逻辑这一特点,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尤其突出。逻辑在20世纪初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很多传统的哲学问题,正是在现代逻辑的引入之后获得了新的解决。人们的认识水平由于符号逻辑的问世而有了进一步的提高。哲学不光是讲道理的学问,还是要将道理严格化的学问。如果说,古代哲学中还混杂着迷信、情感等非逻辑因素的话,那么现代哲学经过了怀疑主义、启蒙主义之后,对于论证的逻辑性的要求可以说是空前的强烈了。一种学说,没有严格的理性逻辑论证作基础,是不能在哲学上被接受的。在当今世界哲学舞台上,不懂逻辑,是难有立足之地的。

我当然反对狭隘的逻辑主义。理性的思维是一种复杂的多要素的统一,在谈论事实,思考人生时,理性和情感等是很难截然二分的。而且,传统所凝聚的某些信念、价值等,本身也构成了我们批判传统信念、价值的出发点,笼统地把它们归结为非理性的并和逻辑对立起来,是很不恰当的。应该看到,没有这些立脚石,批判、怀疑就失去了它的根据。从坏的方面说,把逻辑当作理性的全部,也助长了将手段与目的对立起来,只承认前者有合理批判的问题,而把后者拱手让给偏见、任意和非理性,从而无法对堕落和高尚做出理性的评判。但应看到,所有的思考、批判都有一种形式化的最低要求,那就是合逻辑的思维。固然,理性不等于逻辑,但理性也决不能反逻辑。对于哲学系的学生来说,两个最低的要求是不可或缺的:一,你的思考必须在形式上是不矛盾的,推

论是前后一致的;二,你所使用的概念,其意义必须是清楚明白的,必须能说清是用何方式澄清概念意义的。

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当今一些学生的哲学习作,常见到,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概念,全然不明白其意义何在;一大段的议论,全然不清楚论据与论点的必然关联。结果洋洋大观,不知所云。哲学似乎得了一种臆想病,说着一些自己都不明白的胡话。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懒汉病,一种囫囵吞枣、人云亦云的懒汉病。既然在思想,就应该把它想清楚,或许不够深刻、不够有趣,但至少是亲切的。一条清晰的小河,即便浅,也是有意思的。混沌的大河,即便深,也是深深的一团黑暗。

东方的体悟难道不是哲学的方式之一?禅宗式的体悟自然可以作为哲学思缜(能否叫思维还需商榷)的重要形式之一,但应该看到,在“主体间性”的要求越来越盛的今天,即便是悟得的道理,也要运用逻辑的方式阐释给他人;再者,体悟怕很难是私人内在的,当体悟时,我们其实是在和自己对话,这同样有一个传达问题,而传达就会有一种基本的形式要求。当然,这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。但至少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:从哲学教学的角度说,逻辑是可教的,而体悟则是不可教的,舍“可教”就“不可教”,无论如何,都不是明智的。

综上所述,本文的论点是:我们的哲学教育有着本末倒置的错误。一方面,把不可教的思想、智慧当作知识来教,于是有轰炸式的灌输;另一方面,对可教的部分,如激发思想的讨论、训练思维的逻辑,又极大地忽视。只有改变这种现状,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才能走出衰败的阴霾。当然,这么说,可能会招来驳斥:“谁说哲学衰败了?我们的哲学事业一点也不逊色于他人。”如果此种说法成立,则本文整个立论纯属无的放矢,而如果承认我们的哲学水平落后于他人,那么我们就应该深思:我们的学生——他们是经过了残酷竞争后的佼佼者,那么为什么几年的哲学学下来之后,他们与其它学科的学生的差距却明显可见呢?

注释

[1]阿兰·德波顿《哲学的慰藉》,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,第8页。

[2]《学魂重铸》(上海)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,第210-211页。